

特朗普回朝與美國政經秩序 嬗變的幾點思考



四年一度的美國總統大選於11月5日舉行，最終特朗普(Donald J. Trump)以「大滿貫」的氣勢贏得所有搖擺州，以312票對226票選舉人票擊敗現任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D. Harris)，繼2016年後再次入主白宮，成為第四十七任美國總統，也是自十九世紀末民主黨籍總統克里夫蘭(Grover Cleveland)後首位兩個非連續任期的美國總統。有趣的是，克里夫蘭以「誠實」、「勇敢」、「正直」等清譽流名後世^①，而這些形容詞似乎難以套用在特朗普身上；而且他們在美國政治史上擁有的位置也有着明顯不同：克里夫蘭的第二任期(1893-1897)象徵美國第三政黨體系(third party system, 1850至90年代)的終結^②，而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則意味着他正重寫其第一任期開啟的第七政黨體系(seventh party system)，讓美國國內政治出現深刻的變化^③。

儘管特朗普這次的選舉表現在表面上更進一步，除了同樣擊敗民主黨女性總統候選人，突破傳統「藍牆」(blue wall)，贏得參議院及眾議院的多數控制權外，比2016年總統大選更勝一籌的是他同時贏得普選票及選舉人票。但仔細分析客觀數字，特朗普是否如媒體強調的以壓倒性優勢贏得這場選舉，卻屬見仁見智：儘管特朗普這次得到的普選票較賀錦麗多，但總體而言特朗普得到的普選票並沒有過半數(49.87%)，賀錦麗的得票(48.25%)也是歷年來敗選者中得票比例最高者^④。另一方面，賀錦麗在「藍牆」三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及賓夕法尼亞州)與特朗普的票差均少於2%，合共的票數差距實不足三十萬票，假如賀錦麗能夠獲得這三十萬票，總統選舉的結果將會改寫。因此，在媒體上形容的特朗普大勝，更多是因為美國總統大選採用選舉人票制度，而大部分州份的選舉人票屬勝者囊括制(winner-takes-all)，所以兩人差距被選舉制度放大。不過無論如何，特朗普回朝勢將對美國政經秩序帶來重大的衝擊。

一 國內政治秩序的重寫

2016年的選舉過後，孔誥烽為《二十一世紀》撰文分析特朗普勝選的「種族根源」，表示特朗普勝選的原因是「承載着美國中下階層白人自1960年代以來的憤怒」^⑤。八年過去，「白種怒漢」(Angry White Male)的風潮仍在持續，他們也成為票投特朗普最中堅的一個社經背景族群。然而，對於2024年大選，相對強調「白人」與「非白人」的對比，也許在「白種」以外加上「有色人種」更為恰當，原因是過去八年特朗普在有色人種的支持度不斷上升，更成為部分州份的勝選關鍵。根據全國廣播公司(NBC)的出口民意調查數據，儘管特朗普在非白人社群的支持度為33%，遠遠落後於賀錦麗的64%，但在拉丁裔男性選民的支持度上，卻以55%領先賀錦麗的43%，而兩性差距高達17個百分點，也是歷來差距最大的調查結果。即使在黑人社群層面，特朗普在男性選民的支持度為21%，比起他在女性的支持度7%，多出14個百分點^⑥。

因此，相對於種族及膚色，這次選舉結果的明顯分歧更多是在性別及教育程度。種群政治在美國政治光譜變得不重要的一大原因在於，當愈來愈多有色人種在美國落地生根，他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更少將種族作為投票時的首要考慮，而更多是將社經階級放在考慮之列。正如著有《拉丁世紀：美國最大的少數族裔如何改寫民主》(*The Latino Century: How America's Largest Minority Is Transforming Democracy*)的共和黨政治顧問馬德里(Mike Madrid)指出，拉丁裔選民近年已轉型為「經濟選民」(pocketbook voters)，他們較傾向保護自身的經濟利益，因此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及移民政策更受這些拉丁裔選民(尤其是男性)歡迎^⑦。

此外，對男性而言，性別特質在服務業主導的經濟體系愈發突顯，女性逐漸佔據優勢，令現代男性在學習、職場甚至家庭的權威受到挑戰；在女性地位不斷上升的同時，男性在社會的地位卻逐漸下降甚至受到孤立。正如美國男性問題研究所(American Institute for Boys and Men)主席里夫斯(Richard Reeves)接受《衛報》(*The Guardian*)訪問時指出，賀錦麗—沃爾茲團隊其中一個敗筆在於他們太集中將自己定位為「女性的政黨」(party of women)，也沒有善用副總統候選人沃爾茲(Tim Walz)作為公立學校教師及美式足球教練的「人設」，去建立一套同時兼容男女權益的政綱^⑧。事實上，當特朗普嘗試以「兄弟票」(bro vote)拉攏男性選民投票、提出男性以選票捍衛國家等「陽剛氣」話語作為最後的選舉工程，「性別戰爭」亦悄然地在這場選舉中打響。

而與性別優勢轉變、服務性經濟及全球化相關的社經條件之一，就是教育程度。正如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時期的總統高級顧問索斯尼克(Doug Sosnik)指出，特朗普政策帶來的其中一個結果是，強化了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對立，例如在經濟議題上，特朗普提出全球化對美國低下階層的影響，本質上不分種族而是受到勞動力及技術轉型所影響，也即變相與學歷掛鉤^⑨。

聖路易聯邦儲備銀行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2024 年 10 月發布的資料顯示，以大學畢業生為戶主的家庭每擁有一美元的財富，就比以高中畢業生為戶主的家庭多出 22 美仙，與有讀大學卻沒有畢業的差距更達 30 美仙——之所以未能完成學業，很多時是由於有色人種的家庭問題及經濟困境所致^⑩。教育程度也直接影響民眾對一些社經議題的參與，特別是今天的美國國內以「覺醒文化」(wokeness) 為包裝的議題設定，如多元性別平權、種族問題，以至外交政策與以巴問題等取態及立場。覺醒與否本質上跟種族沒有關係，更多取決於選民的教育程度能否讓他們完全理解並消化這些議題，還是人云亦云地支持或反對這些議題。議題設定，特別是在社交媒體及網上平台的議題操弄，正正是特朗普在過去三屆大選最成功的地方，而是次大選更得到掌控社交平台 X 的馬斯克 (Elon R. Musk) 「全力支持」(all-in)。

從民主黨的角度出發，儘管今天看來賀錦麗敗選屬非戰之罪，畢竟屬「半途出家」的她即使有着荷里活演藝圈群星拱照，最後階段有着強勁的籌款能力，但始終無法在短時間內建立個人的政治形象，亦難有效與現任拜登 (Joe Biden) 政府切割——賀錦麗在接受訪問時表示她難以找到拜登政府政策的不足之處，因此當憤怒的選民認為過去四年生活並沒有改善，在這場仍以 “It’s the Economy, Stupid” (克林頓 1992 年競選口號，後來成為美國的政治流行語) 為主軸的選戰中，賀錦麗的起步點已落於下風。

根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聯同民意調查機構 Catalist 及 Edison Research 在選舉後進行的初步出口民調結果顯示，在以不同年齡群、教育群及種族群分類的受訪者中，只有兩個群組比 2020 年更傾向支持民主黨。第一個群組是有大學學位的白人女性，這其實不難理解：特朗普的家庭保守主義形象、性罪行官非纏身以及墮胎權政策取向，難以爭取這個選民群組的支持。第二個群組相對令人意外——美國傳統政治智慧認為，民主黨的政綱應能吸納年輕世代的支持，但出口民調卻表明在 18 至 29 歲的受訪者中，共和黨得到的支持比四年前增加約 15 個百分點；反之，65 歲以上的「銀髮族」群組是唯一在傳統上傾向支持共和黨、卻在這次選舉輕微轉為靠近民主黨的選民群組^⑪。對此，我們可以留意那些為賀錦麗站台的共和黨人，如前副總統切尼 (Richard B. Cheney) 及其女兒麗茲 (Liz Cheney)、前加州州長兼著名影星阿諾舒華辛力加 (Arnold Schwarzenegger) 等資深共和黨人，他們認為特朗普的基督教民族主義政策、個人的政治品德，以及在 2021 年國會山莊之亂裏不可分割的角色，將對美國憲政造成巨大衝擊，因此在「國家先於政黨」的前提下表態支持賀錦麗。NBC 的出口民調亦表示，有三成四的受訪者表示這次選舉的首要議題是「美國民主制度」，其次才是經濟、墮胎權及移民問題，而視「美國民主制度」為最重要議題的受訪者當中，有八成表示支持賀錦麗^⑫。相對而言，特朗普的支持者卻一直深信 2020 年大選是一場「被偷走」的選舉，因此假如「堂堂正正」地再選一次的話，特朗普不可能落敗。而拜登政府早前要求社交媒體移除有關疫情及選舉假新聞的「前科」，則令矽谷不少放任自由派 (libertarian) 視這

場選舉為捍衛美國傳統自由之戰，因而轉向支持特朗普，當中以PayPal創辦人提路 (Peter Thiel) 為這個群組的核心。

因此，這場選戰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為美國立國根本的兩條支柱——「民主」及「自由」的重新劃界，民主黨及部分共和黨人視特朗普的反傳統菁英、社會政策保守、經濟政策民粹的「國家保守主義」(national conservatism) 為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衝擊，認為他的個人品行、對選舉結果及程序的蔑視、以偏頗的資訊鼓動民粹主義的選舉策略，動搖了美國民主制度的根本；反之，特朗普及矽谷放任自由派(如馬斯克及提路)均認為，民主黨所代表的「自由主義」在不必監管的領域(如社交平台、企業政策、婦女生育權等)作太多監管，而在一些應該監管的領域(如非法移民、芬太尼[fentanyl]及藥物濫用、性別及家庭崗位問題等)卻不作管控，結果是不必要地限制美國公民應該享有、對美國經濟及社會有利的自由，同時擴大那些危害美國公民權利、影響美國經濟競爭力的自由。這樣的重新劃界明顯是跨種族的，例如在穆斯林社群中，特朗普的家庭保守主義可能比賀錦麗的多元家庭主義更貼近他們的信仰；成功抵達夢想之地的拉丁裔移民也會認為後者的非法移民政策影響他們的生計及經濟利益，因此自然傾向不支持賀錦麗。至於他們是否支持特朗普，還是選擇不投票或投票支持獨立候選人，對特朗普而言已不太重要。



這場選戰的其中一個面向為美國立國根本「民主」及「自由」的重新劃界。(資料圖片)

特朗普以萬斯 (J. D. Vance) 為競選副手，放棄在黨內政治資歷較深的魯比奧 (Marco Rubio) 及伯古姆 (Doug Burgum)，得以成功再度入主白宮，算是確立第七政黨體系下共和黨未來政治發展的基調：2008年因應金融海嘯而生的茶黨運動 (Tea Party Movement) 未能在之後的選舉中獲得足夠的政治能量以維持影響力，結果被共和黨菁英有意識地吸收。儘管「特朗普主義」(Trumpism) 在2022年中期選舉後一度沒落，不少特朗普支持的候選人在選舉失利，令不少共和黨菁英認為特朗普主義不過曇花一現，或成為另一個茶黨運動，可被共和黨菁英有機吸收，然而，特朗普及萬斯這一「國家保守主義」團隊順利贏得大選，更是以橫掃七個搖擺州份、重掌參議院多數及維持眾議院多數的全面執政姿態勝出，意味着至少在未來四年「特式右翼政治」將是聯邦政策的主流，反而將傳統共和黨人邊緣化。借用前眾議員金辛格 (Adam Kinzinger) 在民主黨黨代表大會上發言時指出，「共和黨不再是保守派政黨」^⑬，對那些堅持原則(固執)的傳統共和黨人而言，民主黨反而變成他們認可的「保守主義」政黨。

然而，在選情如此激烈的情況下，單是「策反」這些堅持原則的傳統共和黨人，仍難以挑戰特朗普現時的政治力量。此外，以對「民主」及「自由」的不同理解作為攻擊另一方的政治手段，會加強民眾對美國政治制度的厭惡感。當這樣的政治厭惡感磨滅民眾對美國制度的信任，諸如政治陰謀論或假新聞反而變得更有市場，所謂「民主政治的危機」就會成為自我實踐的預言。

二 美國霸權體系的重構

對於並非生活在美國的我們，特朗普二度入主白宮，對中國以至全世界的影響在於其外交及貿易政策。根據前述NBC的出口民調，認為美國民主制度及墮胎權議題最為重要的選民多傾向支持賀錦麗，認為經濟及移民問題最為重要的選民則多支持特朗普。至於從來不是關鍵議題的外交政策，認為這是最重要議題的選民略為傾向支持特朗普，相信是出乎民主黨意料之外的。對民主黨而言，外交政策的結構性問題涉及兩個不同的支持群組，一是國內的進步派選民及大學學位選民，二是國內穆斯林社群及猶太人社群。前者在外交政策上的態度不難理解，從不少美國大學校園出現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運動，不難想像進步派選民在以巴衝突及中東問題上的立場——傾向支持巴勒斯坦或至少希望美國不完全向以色列傾斜。然而，這與民主黨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場有一定程度的衝突。賀錦麗根本沒可能在傳統中東問題上同時討好進步派及阿拉伯裔選民，但其外交政策的模糊立場難免得失猶太裔選民。

事實上，根據全美最大的穆斯林公民權益組織美國伊斯蘭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CAIR)在選後公布的調查，全國穆斯林的投票取向首先為獨立候選人史汀(Jill Stein, 53%)，其次為特朗普(21%)，最後為賀錦麗(20%)，而在關鍵的密歇根州，賀錦麗在穆斯林中的支持度只有14%，落後特朗普8個百分點，與選前的民調有極大的差距。CAIR政府事務總監麥戈爾(Robert S. McCaw)直言，投票結果顯示穆斯林社群對於拜登政府應對加沙問題的不滿，才令史汀的支持度直線上升¹⁹。外交政策成為壓倒民主黨在關鍵州份的最後一根稻草，對於過去四年標榜將美國拉回國際體系以及積極與盟友修繕外交關係的拜登政府而言，其實是一大諷刺。

當然，穆斯林社群更多支持特朗普並不代表他的外交政策親巴勒斯坦及穆斯林社群，這從他提名的外交官員如國務卿魯比奧、駐以色列大使赫格比(Mike Huckabee)、中東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可略知一二。相對於難以在公開言論中得知其以巴問題立場的威特科夫——一個常與特朗普打高爾夫球的猶太裔地產大亨，前兩者對以色列及巴勒斯坦的立場是清晰可見的，例如赫格比曾直言這個世界沒有所謂的「巴勒斯坦人」。與此同時，正如赫格比在訪問中直言，他不是制定中東政策而是執行總統政策的官員²⁰，與威特科夫的任命異曲同工，他們不過是特朗普外交政策忠誠的執行者而已。那麼

關鍵的問題是，二度入主白宮的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將是如何？新的「特式外交」會如何重寫國際政治秩序？

上文提到上一位非連續任期的美國總統克里夫蘭，他的第二任期象徵美國第三政黨體系的終結，而第四政黨體系 (fourth party system, 約 1896 至 1932 年) 在美國政治的定位是「進步時代」(Progressive Era)，當中的代表人物是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塔夫脫 (William H. Taft) 及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總統，他們的外交政策幾乎定調了未來一個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的藍圖：羅斯福在門羅主義 (Monroe Doctrine) 之上引入「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認為門羅主義的重點在於保障美國在西半球的利益不受歐洲列強干預，因此在不干預歐洲事務的同時，美國也須在西半球行使「世界警察的權力」(international police power)，以維持利益核心圈的安全及穩定^⑮。而隨着美國企業由西半球拓展至全球不同角落，經濟利益在「羅斯福推論」下成為美國核心利益，因此美國由「西半球警察」的角色慢慢地過渡成真正的「世界警察」，也就是美國當代霸權主義的雛形^⑯。

作為繼任者的塔夫脫在羅斯福的外交格局上，提出「美元外交」(dollar diplomacy) 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部分修正羅斯福的尚武作風，在「大棒外交」(big-stick diplomacy) 外加強「胡蘿蔔」的元素，強調經濟外交及企業投資對拉丁美洲及東亞的正面作用，鼓勵美國銀行家及企業作跨國借貸及投資，「以美元代替子彈」來推動國家利益及外交戰略^⑰。當然，對於塔夫脫的美元外交，特別是嘗試透過投資在華鐵路以增加美國在東亞的影響力，後世的評價毀多於譽，但箇中的原因更多在於當時的國際金融體系由英國主導，不論英國還是其他早已在華有一席之地的列強，均不希望美國介入中國事務，既是時不我予，也是力有不逮。不過，美元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卻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其中一個核心面向。大棒外交為外交政策的「裏」，美元外交為外交政策的「表」，以軍事及經濟影響力維持核心外交利益，成為美國現實主義外交政策的根本藍圖，也是現實主義者維持美國霸權地位的根本手段。

與上述現實主義傾向相對的，則是美國百年外交政策的另一個面向，即威爾遜提出的「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以及其延伸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威爾遜主義 (Wilsonianism) 或廣義的自由國際主義強調以民主自決為基礎的民主體制推廣，建立多邊合作國際體系，支持共同安全體制 (collective security)，促進諸如貿易、航行等自由，拒絕任何的秘密外交協議等^⑱。另外，不少外交史學家認為，威爾遜的外交政策仍以不干預原則 (non-interventionism) 為基礎，但在人道及和平事務上卻帶有「人道干預主義」(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ism)，例如對俄羅斯革命的介入，實屬超過不干預主義政策的底線^⑲。至於威爾遜倡議並在 1920 年成立的國際聯盟雖然未竟全功，卻為後來建立的聯合國打下基礎，聯同世界銀行 (World 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成為二戰後維繫國際秩序的其中一個重要機構。

事實上，自由國際秩序的一些重要元素，例如國際法及國際組織的建立、經濟及貿易自由、對民主及人權的制度內化等，均是威爾遜主義及其「十四點」(Fourteen Points)的延伸。儘管自由國際秩序近年受到不少挑戰，但在廣義而言仍屬當下國際政治及經濟交流的一個重要秩序建構。而以美國百年外交政策來看，正如外交史學者安布羅休斯(Lloyd D. Ambrosius)和史密斯(Tony Smith)分別指出，即使不同年代的總統對於美國外交政策的演繹有所不同，但具體的大方針仍是以威爾遜主義為基調，只是加入其個人特色元素而已²⁰。

為何要特別提出美國外交政策與國際秩序(特別是自由國際秩序)之間的關係?其中一個原因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建立及其強弱，與美國外交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不論是自由主義派國際關係學者如杜德尼(Daniel Deudney)及艾肯貝里(G. John Ikenberry)，還是現實主義派國際關係學者如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及格拉瑟(Charles L. Glaser)，均認同自由國際秩序的基石之一就是美國在國際政治及經濟政策等方面的霸權地位。而美國霸權地位，自然也包括美國在冷戰後軍事、科技等領域的領導地位²¹。

在軍事層面，根據知名智庫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24年發表的研究報告，2023年美國公開的軍費開支為9,160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 3.4%及全球軍事開支37%，其開支總額超過其餘九大軍事開支最高國家的總和²²。與龐大的軍事開支相對應的，是美國在地緣政治的獨特位置：它是少數同時混合陸權及海權形態的國家。因着美國遠離歐亞各國的獨特地理位置，它在北美洲形成難以被挑戰的陸地軍事霸權，與加拿大及墨西哥的自由貿易協議亦令美國成為該區域無可取代的經濟霸權，可將北美洲豐碩的經濟資源(如天然資源及勞動力)納入國家經濟發展藍圖。但與傳統的陸權國家(如俄羅斯及德國)不同，美國的軍事霸權更建基於它對海權及海洋網絡的控制。在美國本土以外，美國建立了一個以海軍基地及駐海外軍隊為主的「基地帝國」，以此作為維持美國海洋軍事影響力的重要一環，得以介入過去及現在不同的地緣衝突²³。

在經濟層面，儘管中國經濟急速起飛，但中美之間仍有差距，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在短期內仍難以撼動，單是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地位、美元資產作為國家外匯資產的重要性，以及美國息率對其他經濟體的息率影響等三個範疇，中國及其他主要經濟體便難以望其項背：根據國際結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研究指出，即使美元的強勢地位在1980年代後慢慢下滑，但它在國際金融及貿易中仍佔有絕對地位，國家的債券持有、外匯交易結算、貿易支付等，以及各個公私營銀行的體系運作、債券資產、外匯儲備等範疇上，美元均排首位²⁴。

而在科技層面，美國的霸權地位從全球股票市場對於「美股七雄」(Magnificent Seven，即微軟[Microsoft]、蘋果[Apple Inc.]、亞馬遜[Amazon]、Meta等七家科技公司)的追捧可窺一斑。現時討論度最高的人工智能科技公司(如Open AI

及其開發的ChatGPT等)，其母企均來自美國初創企業，而配合其發展的核心技術（如晶片設計及開發等），美國企業也處於領導地位。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的數據，雖然中國提交的知識產權申請數量為世界之冠，但中國與美國在電腦技術相關的申請數量僅相差1個百分點，而美國發明者向其他國家申請知識產權的數量卻是世界第一；美國發明者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仍比中國為高，美國的科技發明更多以外銷為主²⁶。

地緣政治學者蔡斯-鄧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及庫克昌（Charles Kupchan）分別指出，現實主義理論強調的二元秩序（bipolar system）在冷戰終結後被打破，新的自由國際秩序是由美國霸權主導的單極世界，從1993年起全球經濟逐漸走向一體化，東西方交流比冷戰時更為頻繁，其實是美國霸權體系下促進的國際和平現象²⁷。然而，要維持霸權體制穩定，除上述的客觀條件外，更重要的是處於霸權地位的國家願意作適當的犧牲，以國際社會的公共利益及共善（public good，又譯「公共財」）為制定政策的考慮因素。正如國際關係學者雷恩（Christopher Layne）在歸納霸權的根本要素時強調，除了在經濟及軍事有強大的震懾力及推動力外，最重要的特質是願意承擔霸權的「義務」，即領導其他國家建立互惠互利的國際秩序，適當地以共善作為制定國內政策及外交政策的基礎，例如維持國際和平及推動人道支援工作²⁸。

要注意的是，正如另一位研究「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的學者吉爾平（Robert Gilpin）指出，所有的霸權國源起於贏得一場決定性的「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對於美國霸權而言就是有硝煙的二戰（從英國手上正式獲得舊世界的霸權地位）和沒有硝煙的冷戰（從蘇聯手上獲得不可抗衡的全球霸權地位），而終結於霸權體系的不穩定性。他指出，霸權地位的不穩定性源起於霸權體系既苦了霸權國本身，也難以討好其他在體系內生存的國家：從霸權的角度出發，推動以國際社會為主的共善，有時會與推動國內社會的共善有所違背，因此霸權國既要維持國內政治及經濟穩定，也要在國內、國際社會政治及經濟穩定之間取得平衡，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²⁹。

以經濟學者特里芬（Robert Triffin）提出的「特里芬兩難」（Triffin dilemma）為例，當一個國家的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時，國內的短期經濟目標或會與國際社會的長期經濟目標相違背³⁰。例如，當各國貨幣與美元掛鉤或以美元為主要外匯儲備貨幣，其他國家為了維持本國貨幣對美元匯率穩定，必然會增持美元資產，令美元需求不斷上升。美國政府固然可以利用這些需求不斷發債，以提升長期的美元資產來換取國家收入，但美國工業及出口會因為美元高企而失去競爭力，結果換來龐大的貿易赤字。假如美國政府希望透過貨幣政策來調節美國經濟周期情況，而各國經濟周期未必與美國同調，那麼其金融政策及貨幣政策只能「被迫」承擔美國貨幣政策的結果。當中最經典的案例自然是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單方面宣布美元暫停與黃金以固定兌

換率兌換的「尼克松衝擊」(Nixon Shock)，直接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在1973年崩盤。

除經濟及金融層面霸權地位會帶來結構性風險外，霸權國需要進行外交及軍事介入，容易造成不必要的「帝國擴張」。例如，過度頻繁的軍事介入(甚至以海外駐兵的方式維持當地局勢)，以及因應其他國家的要求提供軍事、經濟等援助，霸權國所付出的代價終有一天會超出其得到的政治利益。對於霸權國的民眾而言，他們既不明白為何會出現嚴重的貿易赤字及企業外流，也不明白為何其他國家可以無條件地享有霸權國的軍事保障，得以專心發展經濟；而對於接受霸權體系的其他國家民眾而言，他們既不明白為何國家要以金錢購買霸權國的產品，方便霸權國的企業來當地投資，剝削本地企業發展，也不明白為何在國家軍隊以外有霸權國的軍隊駐扎，有時甚至會發生不愉快事件。就霸權國本身而言，會認為其提供的共善被其他國家利用，成為日後挑戰其霸權的資產，因此對於潛在的崛起者，希望透過經濟方式扼殺於萌芽之時；而對於其他國家而言，當下由霸權國建立的國際體系自然是對其最有利的政治及經濟制度，因此在善用霸權國提供的共善的同時，不忘挑戰霸權的地位，嘗試建立一套有利於自身的國際秩序——這就是米爾斯海默強調的「大國政治的悲劇」^⑩。

因此，特朗普在競選時不斷強調美國霸權正在衰弱，本質上不是錯誤的說辭，但核心問題是特朗普如何看待這看似不可逆轉的趨勢。作為生意人的特朗普，自然選擇了最符合經濟學及商業管理的方式回應：要求其他盟友支付美國提供的共善，並選擇性地削減美國對其他國際事務的付出。美國韓裔學者車維德在撰文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外交政策取向時指出，相對於各國領袖認為特朗普上台帶來的不確定性，他認為特朗普看待盟友的方式始終如一，就是將所有外交關係視為多段「交易式」關係。事實上，特朗普曾多次公開質疑美國是否需要在亞洲盟國駐防，也表明美國不應介入台灣事務，原因是台灣過去多年並沒有繳納足夠的「保護費」，加上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的壟斷地位影響了美國晶片業發展。特朗普治下美國的外交政策無異於保險服務，這固然是旨在簡化美國的外交任務，同時形象化地呈現出他認為的合理的霸權角色：美國不是無條件提供共善的慈善家，而是管理風險機制的服務提供者。這個由「新總裁」特朗普主理的「美國企業」不介意承擔其他國家的安全及政治風險，但所有要求服務的國家均要向「美國企業」支付合理的費用，以獲得相對應的服務權限。車維德綜合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觀察，認為特朗普衡量美國是否提供服務的準則其實相當「明碼實價」：第一是該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結構是順差還是逆差，有沒有從根本上「佔美國貿易便宜」；第二是該國是否有盡到它在軍事開支上的責任，特朗普提出的標準是GDP的3%^⑪。事實上，《金融時報》就指出烏克蘭的「勝利計劃」(Victory Plan)已就特朗普上台後如何獲得其支持加入兩點方案：一是俄烏戰爭結束後烏克蘭軍隊

將替代部分駐歐美軍的任務，二是與西方盟友共享烏克蘭的自然資源^③。假如這兩點原則屬實的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其實深諳如何與特朗普談判以獲得其支持。

三 傑克遜式的管治實驗

當然，最能體現特朗普以「美國企業」的方式治國，仍是特朗普的國內政治改革及人事任命。執筆之時，特朗普已公布大部分主要官員提名名單，例如國務卿選擇曾一度考慮為副總統人選的魯比奧、白宮幕僚長人選為其競選團隊核心懷爾絲 (Susie Wiles)，而國防部長提名人赫西斯 (Pete Hegseth)、國家情報總監提名人加巴德 (Tulsi Gabbard)、負責政府效率部 (DOGE) 的馬斯克及生物科技企業 Roivant Sciences 創辦人拉馬斯瓦米 (Vivek Ramaswamy)、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部長提名人肯尼迪 (Robert F. Kennedy Jr.)、取代備受爭議的蓋茲 (Matt Gaetz) 成為司法部長人選的邦迪 (Pam Bondi) 等。

不難發現，這些人選均是特朗普競選過程中的忠實支持者，不過大多卻是甚少執政經驗或不具專業資格的「普通人」。例如，赫西斯的軍事甚至政治閱歷薄弱，加入政府前是霍士新聞 (Fox News) 的節目主持人；肯尼迪並沒有相關的醫學及公共衛生的學位及專業資格，同時在美國科學界被視為反疫苗、反醫學常理的假資訊推動者；蓋茲涉及性罪行相關的指控，而代替他的邦迪在佛羅里達州出任司法部長時涉嫌接受來自特朗普的不法捐款。此外，威特科夫不過是特朗普的高爾夫球球友；委任世界摔角娛樂 (WWE) 前執行長、過渡團隊的聯席主席之一的麥馬漢 (Linda McMahon) 為教育部長，更令人感到特朗普的政治任命是一種政治酬庸，回到昔日的獵官制 (spoils system) 時代。

事實上，這種任人唯親、以政治盟友及忠誠度為任命基礎的官僚制度，其實也是久被遺忘的美國政治傳統。美國外交史學家米德 (Walter R. Mead) 曾將美國的管治傳統分為四大類別：除上文提到的威爾遜主義外，漢彌爾頓主義 (Hamiltonianism) 強調美國經濟強大是維持美國及全球和平最重要的元素，推動國際自由貿易是美國國家利益所在；傑弗遜主義 (Jeffersonianism) 強調美國國內民主體制的強韌性及人權是美國立國的根本，美國外交政策應以保障國內民主制度及公民權利為依歸，應小心地推展國家利益而非積極介入別國事務；傑克遜主義 (Jacksonianism) 則是美國立國最初也最傾向草根平民的意識形態，它相信美國例外論，同時奉行美國孤立主義，對介入外界事務近乎不感興趣，但假如外交事務與國家利益有着根本衝突，傑克遜主義者卻會以最積極的軍事介入方式迅速地處理問題^④。至於內政層面，傑弗遜主義與傑克遜主義不同，前者強調有序的菁英階級民主，即以協商為前提的菁英共治模式；後者強調平民主義的民主制度，認為傳統的政治階級是腐敗而不近人情的，因此

唯有將權力下放到「平民」(即當時並非出身於政治貴族世家的白人中產階級)，美國的民主制度才能真正成為「美國人的民主」(American democracy)^⑤。而傑克遜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在實際執行上大幅改革美國公共行政及官僚體制，包括限制公務員任期、容許總統大幅度撤換及任命聯邦政府官員，同時提出廢除選舉人票制度，將選舉總統及副總統的權力直接還歸美國公民^⑥。

事實上，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政治顧問班農(Steve Bannon)正是傑克遜式民主及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並成功以此包裝特朗普的內政及外交政策。米德在分析特朗普第一任期時指出，特朗普在2016年的崛起在於前兩任總統布什(George W. Bush)及奧巴馬(Barack Obama)過份演繹威爾遜主義的外交政策面向，不必要地介入中東地區的民主進程^⑦。另一方面，2008年美國次按問題引起的金融海嘯表明當下的政治、經濟菁英腐敗不堪，美國社會因而充斥着對菁英的不信任，最終令政治鐘擺指向孤立主義及平民主義的代表，也就是特朗普提倡的「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政策。當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仍受制於傳統共和黨人及其體制，因此在用人上難以如傑克遜(Andrew Jackson)擔任總統(1829-1837)時可以完全任人唯親，龐大的官僚體制也成為特朗普推行政策的一大障礙。加上當時特朗普政治經驗及閱歷尚淺，無論對內管治抑或對外政策，均難以同時駕馭民粹主義利益及企業菁英利益，因此無法進行大規模改革，傑克遜式的特朗普「美國企業1.0」實驗最終在2020年落幕。

四年過去，特朗普在初選時壓倒性贏得共和黨的提名，大選勝利後大量起用特朗普主義支持者為內閣成員，將代表傑克遜主義的共和黨傳統菁英邊緣化。而在與民主黨的對決中，特朗普以「壓倒性」的氣勢贏得代表威爾遜主義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當中被行刺的小插曲更完滿地填充了草根平民對領袖的浪漫英雄想像。當然，特朗普也許仍無力如傑克遜一樣大幅度輪換政府官員，因此退而求其次，大幅度削減聯邦政府結構——負責推動改革的馬斯克表明他希望聯邦政府機構由現時四百多個大幅削減至不足一百個。有別於第一任期，特朗普沒有連任的考慮，而他委任的白宮幕僚長懷爾絲的個人特長是「從混亂中創造秩序」，以及如何「扭轉局面及觀感」，對於特朗普推動大規模改革有一定程度的幫助^⑧。因此，相對於八年前初試啼聲，即將登場的傑克遜式的特朗普「美國企業2.0」從表面看來更為堅實，也似乎會為美國國內政治及外交關係帶來比2016年更重大、更深遠的影響。至於特朗普能否達到傑克遜的高度，自有待後世評價。

註釋

① H. Paul Jeffers, *An Honest President: The Life and Presidencies of Grover Cleveland*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0).

② James E. Campbell, "Party Systems and Realig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8-2004", *Social Science History* 30, no. 3 (2006): 359-86.

- ③ Gary Gerstl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Neoliberal Order: America and the World in the Free Market Er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2), 230-67.
- ④ John Nichols, "Donald Trump Has Not Won a Majority of the Votes Cast for President", *The Nation*, 19 November 2024, www.thenation.com/article/politics/donald-trump-vote-margin-narrowed.
- ⑤ 孔誥烽：〈從特朗普談到中美關係的未來走向〉，《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8年4月號，頁34。
- ⑥⑫ "Exit Polls" (21 November 2024), <https://nbcnews.com/politics/2024-elections/exit-polls>.
- ⑦ Mike Madrid, *The Latino Century: How America's Largest Minority Is Transforming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24), 151.
- ⑧ Sam Wolfson, "A Fatal Miscalculation": Masculinity Researcher Richard Reeves on Why Democrats Lost Young Men", *The Guardian*, 8 November 2024, 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4/nov/08/young-men-donald-trump-kamala-harris.
- ⑨ Doug Sosnik, "The 'Diploma Divide' Is the New Fault Line in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17 April 2023, www.nytimes.com/2023/04/17/opinion/education-american-politics.html.
- ⑩ Ana H. Kent and Lowell R. Ricketts, "The State of U.S. Wealth Inequality" (22 October 2024), www.stlouisfed.org/institute-for-economic-equity/the-state-of-us-wealth-inequality.
- ⑪ "US Election Results: How Trump Won in Maps and Charts", *Financial Times*, 7 November 2024, www.ft.com/content/392e1e79-a8c1-4473-ab51-3267c415b078.
- ⑬ "The Full Speech Republican Adam Kinzinger Gave at the 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 *Time*, 23 August 2024, <https://time.com/7014257/adam-kinzinger-2024-dnc-speech-full-transcript>.
- ⑭ Ismail Allison, "CAIR Exit Poll of Muslim Voters Reveals Surge in Support for Jill Stein and Donald Trump, Steep Decline for Harris" (8 November 2024), www.cair.com/press_releases/cair-exit-poll-of-muslim-voters-reveals-surge-in-support-for-jill-stein-and-donald-trump-steep-decline-for-harris.
- ⑮ Lara Jakes and Adam Rasgon, "Trump's Middle East Picks Signal Staunch Pro-Israel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13 November 2024, A7.
- ⑯ Kris J. Mitchener and Marc Weidenmier, "Empire, Public Goods, and the Roosevelt Corollar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5, no. 3 (2005): 662-63.
- ⑰ 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 ⑱ "William Howard Taft (1909-1913)", in *U.S. Presidents and Foreign Policy: From 1789 to the Present*, ed. Carl C. Hodge and Cathal J. Nolan (Santa Barbara, CA: ABC-CLIO, 2007), 203.
- ⑲ Lloyd D. Ambrosius, *Wilsonianism: Woodrow Wilson and His Legacy i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 ⑳ Eugene P. Trani, "Woodrow Wilson and the Decision to Intervene in Russia: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48, no. 3 (1976): 440-61.
- ㉑ Lloyd D. Ambrosius, *Wilsonianism*, 1-18; Tony Smith, *America's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311-45.

- ⑳ Daniel Deudney and G. John Ikenberry, "The Nature and Sources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5, no. 2 (1999): 179-96; John J. Mearsheimer,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120-51; Charles L. Glaser, "A Flawed Framework: Why 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Concept Is Misguid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3, no. 4 (2019): 51-87.
- ㉑ Nan Tian et al., "Trends in Military Expenditure 2023" (April 2024), www.sipri.org/sites/default/files/2024-04/2404_fs_milex_2023.pdf, 2.
- ㉒ Robert E. Harkavy, *Strategic Basing and the Great Powers, 1200-2000* (London: Routledge, 2007), 94-174; 范恩 (David Vine) 著·林添貴譯：《基地帝國：美軍海外基地如何影響自身與世界》(新北：八旗文化·2016)。
- ㉓ Patrick McGuire, Goetz von Peter, and Sonya Zhu,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rough the Lens of BIS Statistics: The Global Reach of Currencies", *BIS Quarterly Review*, 10 June 2024, www.bis.org/publ/qtrpdf/r_qt2406b.htm.
- ㉔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dicators 2024*, www.wipo.int/web-publications/world-intellectual-property-indicators-2024-highlights/assets/69723/941EN_WIPI_2024_WEB2.pdf, 10, 17, 14.
- ㉕ Christopher Chase-Dunn, "World-State Formation: Historical Processes and Emergent Necessity",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9, no. 2 (1990): 108-30; Charles Kupchan,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Era: US Foreign Policy and Geo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A. Knopf, 2002).
- ㉖ Christopher Layne, *The Peace of Illusions: American Grand Strategy from 1940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㉗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8, no. 4 (1988): 591-613.
- ㉘ Robert Triffin, *Gold and the Dollar Crisis: The Future of Convertibil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 ㉙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 ㉚ Victor Cha, "How Trump Sees Allies and Partners" (18 November 2024), www.csis.org/analysis/how-trump-sees-allies-and-partners.
- ㉛ Christopher Miller, Max Seddon, and Henry Foy, "Ukraine Seeks to Win over Trump with Natural Resources and Troop Proposal", *Financial Times*, 12 November 2024, www.ft.com/content/623c197f-6952-4229-bfbc-0a96e43d6f2d.
- ㉜ Walter R. Mead,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Providenc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xvii.
- ㉝ Robert V. Remini, *Andrew Jackson an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1833-1845*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4).
- ㉞ Walter R. Mead, *Special Providence*, 218-63.
- ㉟ Susan B. Glasser, "The Man Who Put Andrew Jackson in Trump's Oval Office", *Politico*, 22 January 2018, 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1/22/andrew-jackson-donald-trump-216493.
- ㊱ Michael Kruse, "The Most Feared and Least Known Political Operative in America", *Politico*, 26 April 2024, 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4/26/susie-wiles-trump-desantis-profile-00149654.